

历代诗文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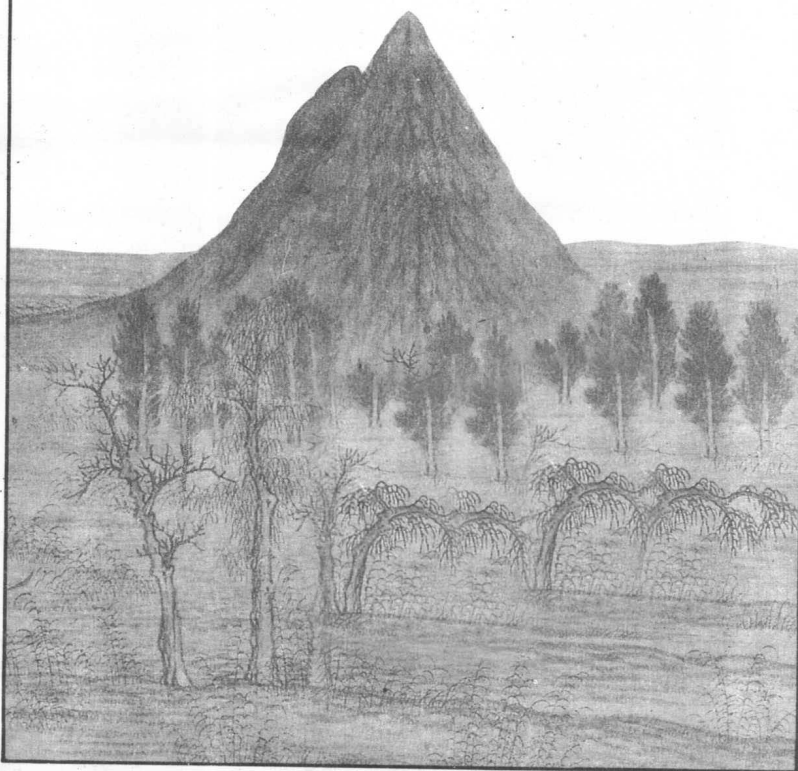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 寓言小品

北人民出版社

周大璞 审订

王玄武 刘 灿 杨小岩

何天齐 汪 洋 张 郅 选注



鄂新登字 01 号

· 历代诗文名作 ·
中国历代寓言小品

周大璞 审订
王玄武 刘 灿 杨小岩 选注
何天齐 汪 洋 张 郦

出 版 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027)5829493
责任编辑 王序平 李燕芝

印 刷 者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发 行 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张 27.25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 插页 5
印 数 40 251—50 000 册 字数 680 千字

ISBN 7-216-01337-9/I·94 定价:27.50 元

本图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由印刷厂调换

编者的话

《中国历代寓言选》是根据诸子散文、历代笔记、杂说及有关史籍选编出来的。这些古籍版本繁杂，各个版本的原文出入颇多。在选编过程中，我们一般只以一个版本为主，对其明显的错漏之处，则参考其它版本，作了一些校正。

本书按作者年代或原著成书先后进行编排，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先秦部分，下册由两汉直至清代，全书共四百余则。除选编原文，还附有注释、译文和说明，并对每个作者写了简介。注释力求详尽易懂，译文尽量忠于原作，说明务求简明扼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本书成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即可阅读的通俗读物，对从事寓言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刘灿同志选录、汇集和初步注释的基础上，由王玄武、刘灿、杨小岩、何天齐、汪洋、张郅六位同志集体注释并完成其它工作；最后，经周大璞教授审阅定稿。在编注过程中，得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图书馆许多同志的指导和支特，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我们知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七月

导 言

我国号称文明古国，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不仅以自己的艰苦劳动和杰出智慧开发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块广阔而又富饶的土地，建立了古代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精神文明，产生出了许许多多富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学艺术珍品，而我国的古代寓言就是这些文学艺术珍品中的奇葩。我国古代寓言最早的出现（就有文字记载而言），虽然比希腊寓言稍晚，但无论在其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教育意义的深刻性，或者在其艺术形象的生动性和表现方法的多样性方面，都不比古希腊寓言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过，有所突破。今天，我们对我国古代寓言进行整理和研究，对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学遗产，总结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为他那篇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小说、乃至神话、寓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决不是什么超自然、超现实的“神”或“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由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一句话，包括寓言乃至神话在内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只不过是人们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反映，只不过是被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时，这种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偶然的原因或得了什么“神”的启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我国最早的寓言作品来看，虽然是以书面文学的形式出现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史书之中，但究其根源，还是出自民间，为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和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而且采取口头创作的形式出现并流传下来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寓言，既然来自民间，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包括寓言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为劳动的需要而创造的；而劳动又先于艺术。人们总是最初从功利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十分清楚，文学艺术的领域，决不是所谓超功利的、不带任何社会目的的“自由的领域”。实际上，从纯粹的实际的功利的目的出发，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正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比如说原始的绘画和雕刻，就是为了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一种“绘画文字”；再如原始的舞蹈，本身就是对于劳动生活和动作的简单的模仿，借以训练人们适应劳动生活的能力；而诗歌既产生于劳动，又以其节奏起着调节动作，激励劳动的作用；神话的创造，乃是原始人为了实现其“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使“神”为自己谋福利的实际的、功利的目的；至于寓言的产生，则是为了适应古人总结和交流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本身就是古代人民生活经验的形象的记录。

如果说，原始的绘画和舞蹈还是对于古代劳动生活的简单模仿和再现，那么，古代的神话和诗歌则是出于原始人对古代无法

认识的社会生活的解释。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对自己所赖以生活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无法解释而又不能不进行解释，于是把这种种自己无法解释的社会和自然现象统统归结于超自然力——神的支配，于是就产生了我国古代的诸如“夸父追日”、“羿射九日”这类脍炙人口的神话。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的眼光逐渐由神转向人，由自然转向社会，于是在讲述神的故事的神话之后，便出现了讲述人的故事的寓言（至于讲述动物故事的寓言也是人格化了的动物的故事，实际上还是人的故事）。由神话到寓言，由讲述神的故事到讲述人的故事，乃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个飞跃。如果说，神话还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所结出的艺术之果，那么寓言则是人类由童年的蒙昧向文明时代迈进过程中，继神话之后创作出来的又一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寓言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到春秋以前的漫长的奴隶制时代。它是继原始神话之后出现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这在我国的一些古籍的片言只语中，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比如《论语·子张》中就载有子夏的一段话，认为来自民间的“小说”之类，“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有“小说十五家”的记载，并说它们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亦刍蕘狂夫之议也”。这就说明，这些东西主要是记录人民口头创作的东西，而寓言故事就正是这样的人民口头创作的记录，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只不过它不象古诗那样由官府采集整理而成为“诗经”，大多数都随之而散失了，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憾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书面寓言就大量出现并且广泛流传起来，这是和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与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分不开的。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腐朽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新兴的封建制度日益发展的时代，当时由于铁器工具的出现，牛耕的

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而经济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工，使更大一批人从事精神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的迅速崩溃结束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的垄断，这样一来，以从事精神生产为主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就有可能产生、存在并且发展了。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文化大繁荣、思想大解放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各抒己见，互相论难而又共同认真探讨时代的问题，摸索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设计了一幅幅“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蓝图，提出了种种政治学说，于是便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这些哲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在他们著书立说、互相争鸣的辩论里，在他们游说国君、出谋画策的过程中，或旁敲侧击，或引而不发，或一语破的，或言此意彼，千方百计地把话说得明白晓畅，娓娓动听。他们还常常借用故事陈义说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文有寄托之意”的寓言故事正好适合担任历史赋予它的这种光荣使命，这样，它不仅日益繁荣，而且迅速成为当时不同学派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正因为如此，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如《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之中，寓言便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寓言发展史上的一座奇峰。

秦汉以来，随着“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寓言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这个时期的寓言，如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新序》、《说苑》，张衡的《论衡》中所保存和收集的寓言仍然承袭先秦寓言的传统，属于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论辩的工具。这些寓言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一般都比不上先秦寓言那样深刻和凝练。但有些寓言也有其独到之处，如《小偷献技》、《枭将东徙》、《曲突徙薪》等寓言艺术上就比较成熟，寓意也比较深刻。到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略有解放，但当时玄学清淡之风盛行，不能不影响到人

民对寓言的开拓工作。这时期秦苻朗《苻子》、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刘昼《刘子》中的寓言创作基本上还是承袭先秦余风，而邯郸淳的《笑林》则风格诙谐，滑稽可笑，可以说，它是使寓言开始从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文人创作寓言的先例。

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摧毁了隋朝统治的根基，李渊、李世民父子窃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唐王朝。由于他们汲取了隋王朝失败的教训，并亲眼看到了农民革命的强大力量，开国以后，他们不得不对农民作了某些让步，采取了诸如均田制、租庸调等比较开明的措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缓和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这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自唐太宗贞观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文化和艺术也发展和繁荣起来了。以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摈弃汉魏六朝形式主义，开一代之文风。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寓言创作已从哲学和史学著作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学体裁。这时出现了一大批寓言作家，除韩愈、柳宗元以外，还有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其中成就卓著，影响最大的要数柳宗元，他把先秦诸子散文中仅作讽谕之用的寓言，发展成了独立完整的文学样式；同时，他给寓言文学注入了更为深刻的现实内容。当他被贬为永州司马，政治上遭到豪族地主集团、宦官的打击和排斥以后，就写了著名的寓言《三戒》，公然申明他的寓言就是讽刺他最憎恶的那些依势横行、“窃时以肆暴”的权贵及其爪牙，使他的寓言成为富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

宋、元时期，寓言一度消沉下去，除宋代林昉的《田间书》以及宋人伪托苏轼著作的《艾子杂说》外，为数甚微。到了明、清两代，寓言又象枯木逢春，蓬勃发展起来了。明王朝也是夺取农民起义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建立自己的家天下后，在政治上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鼓励垦荒、减轻赋

税、兴修水利、抑制强暴；在文化上则大设文字狱，规定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文人们往往因一字不慎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这样，尽管经济有所发展，文化学术却不得不处于窒息压抑之中。一些文人不得不谨小慎微，少谈政治，因此，这时期的诗文著作很少反映现实的。但不少作家还是运用寓言来隐晦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这时期的寓言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比较著名的有宋濂的《燕书》、《龙门子凝道记》；刘基的《郁离子》；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耿定向的《权子》；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广笑府》；庄元臣的《叔苴子》；江盈科的《雪涛小说》，等等。这时期的寓言，大致沿着两条途径发展：一是承袭先秦诸子散文的传统，作为哲理散文的从属部分，如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刘基的《郁离子》等，都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哲理，抨击当时的政治，宣传自己的观点的。一是继承唐代的寓言传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而创作，而流传。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就是这时期寓言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它的内容较为深刻，情节曲折动人，语言精练优美，可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寓言小说。这时期的寓言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寓言与笑话浑然一体，一般都比较滑稽诙谐，富有情趣。

到了清代，进一步发扬了唐代寓言的传统。这时期的寓言散见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乐钧的《耳食录》等著作中。清朝以后，解放以前，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仍然在文艺的百花园地占据着它应有的地位。解放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仍然出现不少好的寓言，继续放射出它灿烂的艺术光辉。

从民间口头创作到先秦诸子百家的哲理寓言，从唐代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寓言的涌现到明、清寓言的大发展。我国的古代寓言的确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

二

我国古代寓言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内容极为丰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都有所反映。本书所选寓言，就其思想内容和客观意义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面的，即富于哲理性的寓言。

这类寓言，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比喻和故事，总结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批判和讽刺了唯心思想、鬼神观念和形而上学。

首先，许多寓言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世界，必须承认和尊重事物的客观存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则，不管有意无意，都会碰钉子，闹笑话。《韩非子》中的《和氏璧》告诉我们，卞和在山中捡得的那块玉石，的确确是一块宝玉，尽管别人说是石头，卞和因之被砍掉了两只脚，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最后在事实面前，人们还是承认了这块无价之宝。这个寓言启发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反映它。尹文子的《山雉与凤凰》，说的是有人把野鸡当凤凰卖了，许多人也就跟着说是凤凰，但是野鸡终归还是野鸡，它决不会因为许多人说是凤凰就变成了凤凰。《列子》的《鍤鍤剑与火浣布》中的皇子，因为自己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鍤鍤剑和火浣布这类奇异的东西，就一口咬定世界上不会有这种东西，结果事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吕氏春秋》中的《宋王与使者》，讲的是宋王派人去侦察敌情，但又不愿意听人报告对他不利的真实情况，甚至一再残暴地将报告真实情况的使者杀掉，而报告假情况的人反而得到重赏。象这样无视客观事实、甚至存心歪曲事实真相的人，是决然不会有好结果的，后来宋王果然受到了国破身亡的历史性惩罚。刘基的《宋王好非楚》讲的也是类似情况：宋威王非常讨厌

楚国，明知楚比宋强大，但他不顾这个客观事实，硬要朝廷官员和外国商旅都“颂宋非楚”，造成一种楚不如宋的假象，结果被楚国打得大败。不尊重客观事实，在大的问题上，如上所述，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日常小事上，也一定会出洋相，闹笑话。《韩非子》中的《疑邻窃铁》，讲一个人丢失了一把斧头，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了，于是看那个儿子走路、表情、言谈、动作，一举一动都象是偷斧头的；后来这个人在坑里找到了斧头，再看邻居的儿子，态度动作没有一样象偷斧头的了。这则寓言唯妙唯肖地刻画了主观主义者的心理状态，揭露了唯心主义的荒谬可笑。刘基的《食蛇》，讲一个喜欢吃蛇的南方人到北方的齐国去旅游，有个齐国人招待他很好，他十分感激，就用所带的蛇肉干酬谢主人，把主人吓了一跳，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主人嫌他的礼物太薄，于是又捉了一条特大毒蛇送给主人。象这样不了解情况，自以为是，主观地处理问题，尽管动机很好，也难免不闹笑话。《庄子》中的《丑女效颦》所说的那个丑女，不顾自己的条件，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模仿别人，结果不也是大出洋相吗？

要真正做到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就要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人们的行动才能成功，否则就一定失败。《庄子》中的《庖丁解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庖丁为什么宰牛宰得那么顺手？就是因为他通过无数次解牛的实践，熟悉了牛的生理构造，掌握了解牛的规律，所以杀起牛来能够作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令人惊叹。反之，我们看《孟子》《揠苗助长》中的那个宋人，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想让禾苗快一点生长，但由于他无视禾苗生长的客观规律，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把庄稼弄死了。《庄子》中的《鲁侯养鸟》，讲鲁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喂养一只海鸟，结果一天就把鸟喂死了，这当然也是违反了海鸟生活的规律而得到的必然结果。

其次，许多寓言启发我们，要正确认识世界，在生活和斗争

中取得胜利，还必须用辩证的观点观察事物，特别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特点，努力克服片面性和局限性。

一部分寓言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批判了那些墨守陈规、泥古不化的守旧分子。例如：《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荆人涉澭》，告诉我们的就是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跟着变化，否则就要失败、就要吃亏这样的道理；《吕氏春秋》中的《其父善游》，《韩非子》中的《卜妻为裤》、《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寓言，嘲笑了那些不管情况的变化，只知一味墨守陈规、抱残守缺的保守分子；宋濂的《迂儒救火》，纪昀的《傅显》等寓言，则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迷信书本教条、不懂世务、不通权变的迂腐学究。这些都从反面说明了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道理，告诉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酌情办理。

另一部分寓言告诫人们看问题要全面，不要片面，要通观全局，不要坐井观天。《韩非子》中的《二人相马》，《吕氏春秋》中的《相马术》，《刘子》中的《公输刻凤》，苏东坡的《日喻》，讲的都是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能看到一点就下结论，否则就一定会弄错。《战国策》中的《惊弓之鸟》，《韩非子》中的《画荚者》，《列子》中的《杨布打狗》等寓言，则告诉人们观察事物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不能为偶然现象所迷惑，而要深入事物的本质。《庄子》中的《望洋兴叹》和《埳井之蛙》，说明世界无比广阔，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天地，才能克服观察问题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还有一部分寓言反映了对事物相反相成、互相转化的认识。《淮南子》中的《塞翁失马》，虽然是从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祸和福、好和坏，这同我们今天的标准有些不同，但仍然生动地说明了祸和福、好事和坏事相反相成、互相转化这样的辩证道理。苏东坡的《乌贼求全》和林昉的《墨鱼自蔽》，说的都是乌贼（即墨

鱼)能施放墨汁掩蔽自己,但同时却又暴露了目标,被别的动物或人所捕获。这都是启发人们认识一件事情的两重性,看问题不要绝对化。

此外,我国古代有不少寓言是直接否定和批判鬼神的。《荀子》的《涓蜀梁》、《庄子》的《齐桓公见鬼》,都否定了鬼的存在。《韩非子》的《画鬼最易》,说鬼是现实中没有的,可以瞎画一通,这也是否定了鬼的存在。还有一些寓言,则歌颂了不怕鬼、不信神、敢于同鬼神作斗争的英雄行为。如冯梦龙的《辱神无祸》,就讲了一个打柴的农民敢于把庙里的尊神打倒,把它横在水沟里架桥的故事;纪昀的《田不满》,歌颂了一个长工敢于同“畏盛凌衰”,欺软怕硬的鬼怪作斗争的事迹……。这些当然都有政治上的含义,但从否定鬼神,批判鬼神观念这点来说,这些寓言都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第二类,是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可以说是政治性寓言。

我国古代寓言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大一部分寓言政治性很强,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情况,总结了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和方法策略。

例如:《韩非子》中的《唇亡齿寒》,就总结了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然后又回师灭掉虞国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面对强敌的侵略,小国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启发人们,要认清共同的主要敌人,不要在敌人面前互相争斗,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敌人得利。《魏书》中的《阿豺论折箭》,用“一箭易折,众则难摧”的简单事实,深刻地说明了只有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而《韩非子》中的《虺虫自斲》则从反面指出,内部互相倾轧,只能自取灭亡。《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讲的是一个谋士劝魏王不要攻打赵国,说这样作只会离称霸成王的目标越来越远。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最要紧的是确定大方向和目标,不要做违背这个大方向的事。当然,这个寓言的意义不

限于政治斗争，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它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成语。《韩非子》中的《魏王索郑》告诉人们，对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要针锋相对地顶回去。刘基的《道士救虎》，讲一个道士救起一只落水的老虎，结果被老虎咬伤；蒲松龄的《藏虱》，讲一个人可怜一只虱子，结果被虱子咬了，中毒而死。这都是告诫人们，对凶恶的敌人，对害人虫，不能姑息宽容，否则必受其害。《战国策》中的《田单攻狄》，讲田单能够打败强大的燕国，但却不能战胜小小的狄国；刘基的《蜈蚣自大》，讲蜈蚣能战胜凶猛的毒蛇，却被看起来软弱无能的鼻涕虫杀死。这都是因为胜利者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结果。这类寓言无论在阶级斗争，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还有一些寓言讲到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战国策》中的《老虎求生》，说一只老虎被猎人捕获，拴住了脚掌，但老虎不惜咬断一只脚掌逃走了；《权子》中的《孔雀爱尾》，讲的是一只孔雀由于过分爱惜自己的尾巴，终于被擒。这两个寓言从正反两个方面启示人们，在政治斗争中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当事关全局存亡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局部，保存全局，否则，是很危险的。讲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寓言，如《卞庄子刺虎》（《战国策》和《史记·张仪列传》均载有这个寓言），讲的是利用两虎相斗，一死一伤，而一举获得双虎的故事，它说的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的道理。《聊斋志异》中的《螳螂捕蛇》，讲的是小小的螳螂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敌人的短处，制死了一条巨蛇。《牧竖》讲两个牧童，使用疲劳战术，制服了凶恶的母狼。《大鼠》讲一只猫跟一只大老鼠搏斗，猫先让几步，等到老鼠疲惫和懈怠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老鼠咬死。这些都是对敌斗争的很好的策略和方法，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还有不少寓言揭露和讽刺了剥削阶级和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庄子》的《触蛮之战》，把当时自恃强大的诸侯国，比喻为在蜗牛触角上建立的“触”、“蛮”等小国家，揭露它们为争夺地盘

打仗，每仗“伏尸数万”。这是对当时带给人民无穷灾难的兼并战争的批判。《骷髅》则反映了生不如死的社会现实，庄子问骷髅是贪欲丧生还是失理而死，是为国战死还是失节而亡，“是饥寒夭折还是寿终正寝，骷髅却心安理得地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人生的累赘和忧患，死人却没有这些。”接着他便历数了死后的乐处：“人死了，上面没有君王，下面没有臣子，又没有冬春的变化，可以从容不迫逍遥自在过日子，王侯之乐也不过是这样吧！”当庄子要叫掌管生死之神让他复活，使他和妻子骨肉团聚时，骷髅却忧心忡忡地说：“我怎能放弃王侯之乐，而再去忍受人间的痛苦呢！”这是旧社会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对反动统治者的无情控诉！封建统治者及其官僚爪牙，大都是一批利欲熏心、欲壑难填的豺狼。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吕氏春秋》的《竭池求珠》，讲宋王为求得一颗宝珠，兴师动众，掏干池水，造成池鱼尽死。这其实是统治者为了搜奇掠宝，聚敛财富，不顾人民死活的写照。江盈科的《纵兽尝人》，揭露一伙荒淫无耻的酷吏以兽尝人取乐，把一个好端端的城镇弄得人烟绝迹。《列子》中的《齐人攫金》，讲的是明火执杖地抢劫。《吕氏春秋》中的《强取人衣》，讲的是编造一套“理由”使抢夺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孟子》的《孺间乞食》、《庄子》的《曹商使秦》，揭露了那些以卑鄙手段猎取功名利禄者的丑态。柳宗元的《三戒》等寓言，讽刺了那些仗势横行，“窃时以肆暴”的封建权贵及其爪牙。他的《蝜蝂传》、《哀溺》等寓言，则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日思高位，大其禄”，“而智则小虫”的利禄之徒。《庄子》的《儒以诗礼发冢》揭露了剥削阶级道德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战国策》的《不死之药》、《韩非子》的《不死之道》，讽刺了封建统治者追求长生不死的愚蠢行径，同时揭露了他们任意杀戮人民的残暴行为，等等。总之，这类暴露社会黑暗的寓言，在长时期内，曾擦亮人们的眼睛，鼓舞人民同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

另外，有少数寓言实际上是歌颂和鼓励人民起来和统治者作斗争。如《郁离子》中的《狙公餒死》，讲楚国有个靠养猴子过活的人，每天让群猴到山里去给他采摘果子。一天，群猴在山里经过讨论，认识到山里的果木不是它们主人栽的，不经过它们主人谁都可以摘取，它们不应该受主人使唤。于是大家等主人睡下以后，破坏栅栏，毁掉笼子，取出主人的积蓄，集体跑到森林里再也不回来了，他们的主人终于活活饿死。

还有一些寓言是赞美和歌颂所谓圣君贤相的品德的。如《韩非子》的《子罕之宝》说宋国大夫子罕不徇私受贿，廉洁奉公；刘安的《公仪休嗜鱼》，说公仪休做了鲁国相国以后，不因为自己喜欢吃鱼而贪赃受贿；刘昼的《民不识禹》，歌颂夏禹不为名不为利、呕心沥血为民治水的埋头苦干精神；《吕氏春秋》中的《子罕忧邻》，说子罕身居高位仍不忘百姓疾苦；《黄羊举贤》说祁黄羊在选拔人才上大公无私，如此等等。这些寓言所涉及的人和事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寄托着人民的理想，因此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类，是关于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寓言。

生产斗争方面，《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宣传“人定胜天”这样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这个寓言的客观意义当然不限于生产斗争，在社会阶级斗争和学习当中，都要发扬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庄子》中的《汉阴丈人》批判了一个因循守旧，不相信科学，¹¹反对新生事物的典型，启发人们把科学技术用于生产斗争，就可以大大提高功效。《封人言政》告诉人们种庄稼要深耕细锄，不能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不然就会象俗话讲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得不到什么收获。《墨子》中的《公输削鹄》提出劳动要讲究实效，如果做出来的

东西不能为民造福，即使做得象鲁班的喜鹊那样“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还不如木匠三刀两斧砍成的车辖实用，它尽管很粗陋，却可以“任五十石之重”，使人真正得到好处。《吕氏春秋》中的《生木造屋》，讲一个叫虞庆的人，对建筑一窍不通，却大谈生木（刚砍下的木材）能够造屋的道理，使得有实践经验的工匠都辩不过他，不得不按他的意见办事，结果没有几天，房子就倒塌了。这个寓言启发人们，不要光听那些说得头头是道，并无实践经验的人的话，而要多尊重有经验的内行的意见；否则，就会搞瞎指挥，造成不良后果。以上这些寓言，生动形象地总结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寄托了深刻的道理，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学习方面的寓言为数也不少，涉及的内容很多。《孟子》的《学弈》告诉人们，学习要专心致志；否则，老师再好，个人再聪明，也是学不好的。《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讲一个驼背老人用长竿粘蝉，就象在地上拾东西那样容易，孔子问他有什么诀窍，老人回答说：“我用五六个月时间，练习在长竿上放上两个圆球而不掉下来，捕蝉时蝉就很少能够跑掉；放上三个圆球不掉，十只蝉顶多能跑掉一只，放上五个圆球不掉，那么捕蝉就好像伸手拾东西那样，万无一失了。另外，我捕蝉时身子站得稳，就象一株树墩子，我举起手臂，就象枯树枝，天地虽大，万物虽多，我看见的只有蝉翼，我不转身，也不侧身，不因外物的干扰而转移我对蝉翼的注意力，这样怎么会粘不到蝉呢！”孔子听了称赞不已，对他的学生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说的不正是这位驼背老人吗！”这个寓言生动地告诉我们，学习一件本领要苦练基本功，要用心专一。《郁离子》中的《常羊学射》，讲一个人射箭的时候，把一片树叶放在百步之外，他能十发十中，如果在那里放上十片树叶，他就没有把握射中了。这是因为树叶太多，形状又相同，干扰了他的注意力。这也告诉我们，学习一样东西，用心专一，